

清华“不唯论文”为高校改革作表率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近日,清华大学发布新修订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明确不再将博士在学期间发表论文达到基本要求作为学位申请的硬性指标,也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评价博士学术水平的唯一依据。取消学校层面的统一要求后,清华将鼓励各学科依据学位论文以及多元化的学术创新成果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

论文数量是高校的“学术GDP”,直接影响高校排名高低和高校领导的政绩。清华大学不再强制要求博士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魄力。这种完善学术评价制度的新探索,有助于让清华的教育和学术摆脱功利,也为高校破除“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痼疾作了表率。

长期以来,各高校要求博士生发表一定数

将博士生从过去不合理的学术评价制度中解放出来,有助于从整体上优化学校的创新环境、学术环境。在破除“五唯”的改革方面,谁能率先跳出“学术GDP”的思维局限,谁就赢得了引领未来的先机

量的核心期刊论文才能审议学位,遭师生诟病已久。一方面,这种“唯论文”的学术评价制度,忽略了不同学科的特性和差异,限制了一些学科的创新与发展;另一方面,博士生迫于论文“指标”压力,往往只能选择迎合学术期刊口味的“短平快”课题,不能保证博士培养质量,反而可能影响博士生群体身心健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学术不端行为。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解决学术评价指标问题,已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比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

副主委胡卫就建议修订《学位条例》有关学位授予的相关规定,对“研究生发表论文才能毕业”进行合法性审查,规范研究生毕业考核程序等,让研究生教育的重心回归于人才培养。

有必要指出的是,清华取消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的硬性要求,并不等于一些人解读的降低学术门槛。须知,清华反对的不是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而是“强制要求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从目前已知信息来看,清华不仅会严格考核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实行严格的博士生分流与退出制度,还在博

士生资格考试、选题报告、中期检查、最终学术报告等关键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世界范围来看,实行更科学、更灵活的学术创新成果评价机制,已经是大势所趋。论文依然很重要,但将博士生从过去不合理的学术评价制度中解放出来,由“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有助于从整体上优化一所学校的创新环境、学术环境,激发出更多高质量的原发性、前沿性、跨学科研究。在破除“五唯”的改革方面,谁能率先跳出“学术GDP”的思维局限,谁就赢得了引领未来的先机。

作为国内最知名的高校之一,清华大学的诸多探索都具有风向标意义。我们期待清华“不唯论文”的改革能形成良好的示范意义,也期待能有更多高校积极响应,结合自身实际推出各种学术评价改革制度,切实改变功利的教育观、学术观,为培养一流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大棚户清理整治的冷思考

近期,国家正全面清理整顿“大棚户”“山庄别墅”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保护耕地,从严控土地用途,对违法者坚决不手软。地方在执行政策时也要真正领会中央精神,全面调研,区分哪些是真正要打击的破坏耕地行为,哪些是为农业服务的举措,避免“一刀切”,操之过急,“一拆了之”带来的后遗症

本报记者

“大棚户”问题,是指一些工商企业、个人及组织借建农业设施或农业园区之名,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甚至永久基本农田,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行为。

在发达地区、大中城市郊区、风景名胜,还有各类农业园区,把房子“种”在耕地上,曾是吸引开发商投资的“亮点经济”;“来郊区住私家庄园”的广告语,很多人也都不陌生。就算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仍有村民心存侥幸。记者调研的一个小村庄里,一户人家的15根水泥桩高高矗立在自家的耕地上,户主表示,“等风声不紧,还会接着盖楼房”。

“如此触碰‘农业地农’底线,直接影响国家粮食安全,早就该整治了。老百姓为这次集中清理拍手叫好。”西部省区某农业协会的负责人说,“有些遗憾的是,不少地方看似是执行了文件,但实际操作是‘一刀切’。”

看护房整改能否给点时间

记者到大棚户重灾区的城郊地带看到,那些整齐的小楼房直接夷为平地,建在大棚边的看护房有的全拆了,有的拆了一半留一半,这里的“私家庄园”毕竟还是少数,看护房在清理整治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反映的诉求意见也最为集中。

“上面没给我们下通知,一夜之间就全拆了。”农民韩虎军说,2011年市政府下红头文件鼓励农民搞设施农业,明文规定看护房可以建80平方米。最近突然间就给全拆了,都没给个整改时间。

确实,在2014年出台的《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文件中,规定大棚看护房面积不得超过15平方米。不过,记者采访发现,北方地区把看护房一般都建成了七八十平方米,主要是因为15平方米在现实中不够用,尤其是对于同时经营几个大棚的大户来说,冬季存储蔬菜、农机具、生产资料、安置取暖设施以及生产雇工食宿场所等,需要的空间更大。大棚种植者的住宅往往远离大棚二三十公里,在农忙季节也习惯住在看护房里。还有农业园区有千亩以上,按照有关规定的农业园区附属设施占地面积最多不超过10亩的限定标准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总体来说,尽管面积超标,这类看护房确实是从事和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农户呼吁给予整改规范的时间。

分清界限,分类治理

为了应对检查,避免被拆除,一些农户绞尽脑汁。有的农户,拆除了有门窗的一面墙,把房变成棚。农民赵二永前几天就拆除了有门窗的一面墙,房屋变成敞开的棚子,各种包装纸壳、农机具暴露在外。他情绪低落地说:“夏天淋雨,冬天受冻,瓜果蔬菜摘下来没法储存,等着上面有个说法。”

“基层有必要详细调查哪些是真正搞现代农业的大棚,哪些是农旅融合必备的配套设施,哪些是打着现代农业幌子非法占地的,该拆的拆,不该拆的拿出整改办法。”面对记者的想法,西部一分管大棚户整治的副县长表示很难做到。

不光“堵”还要“疏”

一位分管农业的干部建议说:“休闲农业大部分在村庄外,有的离村庄十几里,很多县没有那么多空闲的建设用地,想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有很大困难。希望国家和各级政府在下步的规划中,能够合理地规划一部分用地,作为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在保护耕地红线的基础上,给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留出一部分空间。”

“好人主义”要不得

本报记者屈凌燕

近期,浙江永康市两村党支部书记因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两个村的党员受到集体提醒谈话处理,相关镇党委还对两个村党支部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教育整顿。按照党纪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应给予判处有期徒刑的党员开除党籍处分。但是村党支部在召开党员会议表决时,碍于“都是同村人,尽量不得罪”的“老好人”想法,村党支部书记带头不同意或弃权,导致党支部会议未能形成决议。

在基层,一些党员将党性原则抛之脑后,无视事实依据,“装聋作哑”,或对违纪问题轻描淡写甚至为当事人评功摆好,或明哲保身不表态,严肃的组织程序被好人主义的庸俗作风所破坏。一些村党支部执行组织生活会、“三会一课”等制度存在走过场现象,党内政治生活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存在平淡化、庸俗化、随意化问题。

在基层尤其是农村,还存在较典型的熟人社会特征,有的党员干部之间有亲缘关系,有的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一起长大的兄弟,坚持原则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拿出更多的勇气。要下大气力解决好好人主义,需要认清好人主义其实质与危害,才能对症下药。

首先,好人主义的实质是个人主义,它只讲私情而不讲党性,只看关系而罔顾原则。针对这种病征,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总开关”,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事业为重,敢于担当。

其次,坚持原则,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拿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这是防止和反对好人主义的有效法宝。

第三,在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中,要把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的重要依据,应充分体现增强其可操作性,形成防止好人主义的“硬约束”。

防止和反对好人主义,还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该曝光的曝光,该通报的通报,该惩处的惩处,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让好人主义无所遁形。

假冒“老中医”

据央视财经报道,仅仅读过三年夜校的犯罪嫌疑人周某,打着“孟河医派”“中医世家”“祖传秘方”的旗号售卖中药膏方,涉案金额超百万元。消费者自以为花高价买到的祖传秘方,实际上掺杂了违禁药物、西药成分甚至是罂粟等毒品。制作成本五六百元,添加了罂粟壳,就卖到三四百元,添加了西布曲明或西地那非,有减肥功能的,价格直接到880元。

漫画:曹一

中医确实有一定养生保健的功能,但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务必擦亮双眼,不被“祖传”“世家”等旗号所蒙蔽。应当查看行医资质和营业执照,别拿生命健康开玩笑。

本栏主持:刘晶瑶

画里有话



信息公开为何“两头热中间冷”

本报记者白靖利

将于5月15日起全面施行的“修订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仅扩大了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范围和深度,还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与否的界限并完善了依法申请公开的程序规定。新修订的条例将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也能更好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and 依法治国在各地各部门的落实。

从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到两办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再到施行修订后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近年来,中央对信息公开工作的决心和力度以肉眼可见的力度在加强。另一方面,民众对住房、环保、安全等民生方面的信息公开诉求与日俱增,越来越多人主动依法申请信息公开以维护自身权益或监督政府权力。

虽然中央要求掷地有声,民意呼唤也真真切切,但从相关部门对一些地方,部门政务网站建设等相关信息公开的督查通报、记者的采访

经历,以及更多民众欲求公开而不得的情况来看,信息公开在不少地方和部门中间被做了“冷处理”。

各地各部门纷纷开办了门户网站,有的还开通了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看似在与中央要求对标对表,实际上有一些根本经不起考验:打开这些美观度和用户体验都不佳的网站、客户端、公众号,领导去哪里视察、开了什么会、做了什么工作倒是面面俱到,甚至文视图俱全,但真正事关民生利益和政府透明度的信息几乎没有,还得让群众费尽心思去角落里找。

根深蒂固的“家丑不可外扬”思想,让一些领导干部在面对需要公开信息时,习惯性地存在侥幸心理,采取推诿、遮掩等办法,慢公开、假公开乃至不公开,让民众叫苦不迭。

“真相才能粉碎谣言”,越早公开信息透明,越有助于解决问题。那些“假慢不”的信息公开,最终不仅会使舆情汹涌,还会进一步扩大谣言散播的速度和空间,最终损害政府公信

力。作为打造“法治政府”“阳光政府”的重要路径,政府信息公开以其提高决策的透明度、提升公众的参与度、防止权力腐败和不当行使等诸多作用,备受社会期待。修订后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仅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与否的界限,还细化了监督和保障等方面的要求,体现了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

面对中央三令五申的要求,一些地方领导却总以各种理由对信息公开进行“打折降价”处理。类似无视中央精神与民意呼唤的搪塞推诿,让信息公开处于“两头热中间冷”的尴尬境地,不仅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还与全面从严治党 and 依法治国道路背道而驰。

必须真正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工作的考核、社会评议和责任追究制度,让主动公开、真正公开者受益,而那些慢公开、假公开和不公开者受到应有的惩处。如此多管齐下,各地信息公开才可能摆脱现有思维的局限,从“两头热中间冷”的尴尬中走出来。

用上级的“担当”真正为基层“减负”

本报记者陈席元

2019年是“基层减负年”。记者连日来在东部某省走访时,不少基层镇村干部却反映“减负”获得感不强。

近日,在某重大事故发生地,有干部向记者诉苦,该事故发生后,但凡涉及安全生产方面的事情,上级各部门是“互相推诿、避之不及”。比如,当地有一家菜场要进行综合整治,乡镇与县住建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多方协商,结果还是以“属地管理”为名,将责任推到乡镇政府头上。

“我就纳闷了,当初批建这个菜场的时候,对于明显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怎么没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听取乡镇意见呢,现在要整改就推给我们?”乡镇主要负责人直言道,“我想反问,这个菜场难道不是在县政府辖区吗?各个局作为县政府职能部门难道不应该为县政府承担起属地管理责任吗?”

越是机制衔接尚不畅通的地方,越需要条块之间各担其责,保护基层干事落实的积极性。有的地方只“传”只“压”,层层加码,一味问责,长此以往,部分基层已出现“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麻木苗头

“可以说,属地管理四个字是我们基层村干部最讨厌的。”江苏苏州一名村党委书记说,“村级没有执法权,但是辖区范围内所有事情都要你牵头。以拆违为例,要我们村干部冲在最前面,城管等部门反而成了配合方。”

“属地管理”和责任状,已经异化为上级将责任风险甩给下级的挡箭牌。”东部某省一名村支书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根针最后都到村里,很多工作只要实行属地管理,不论村里能不能解决的事情都落下来,减负从存量上就减不动。”

近年来,随着深化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步伐的推进,各类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也在往基层下沉。这一过程中,越是机制衔接尚不畅通的地方,越需要条块之间各担其责,保护基层干事落实的积极性。然而,压力层层传导、责任层层落实,到有的地方,就变成只“传”只“压”,层层加码,一味问责,长此以往,部分基层已出现“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麻木苗头。

不少基层干部发现,从“管理”转向“服务”以后,很多工作缺少抓手,任务难以落实;会议议而不决,决而不定、定而不行;文件语焉不详,还需要出台细则才能执行,基层工作

大刘的「毛病」

前不久,我回老家参加表侄的婚礼。过去农村往往是在自家院子里操办婚礼:自己买来食材,从厨艺高超的村民中请一位掌勺师傅,至于锅碗瓢盆、桌椅板凳,自家不够用就到村里其他人家去借,还的时候带上点吃的、喝的作为回礼,东西虽然不值钱,但一借一还却能让全村人都沾上喜庆的气氛,这让村带有“众筹”味道的乡村婚礼显得格外热闹。不过,当下农村婚礼也开始向城里学习,为了方便,省事,大家开始普遍选择在饭店举办婚礼,表侄的婚礼也不例外。

中午,参加婚礼的人群来到饭店,刚一落座,服务员便给每个人发了一套一次性餐具,这套餐具包括一个塑料小碗、塑料杯子、塑料小勺子,外加一包餐巾纸。正当我感叹现在乡村饭店餐具供应也如此贴心的时候,却看到邻座的大刘拿出餐巾纸后看也不看,直接扔到了地上,这让我不仅好奇起来。大刘看出了我的好奇,转过身来对我说这种餐巾纸太脏了,劝我也不要

用这种餐巾纸。大刘说自己前两年在外打工时曾在一家纸巾厂工作,工作中发现一些低端纸巾厂生产出来的餐巾纸看着虽然是白白净净,甚至还带有香味,但其实生产环境十分恶劣,让人触目惊心,产品质量更是不能让人放心。大刘说这些餐巾纸大多销往了农村,所以每当拿到这类餐巾纸,他马上就想到了生产车间里的污水四溢,如果不赶紧扔掉,估计他对中午的饭菜都难以下咽。

听完大刘的陈述,我也不禁沉默起来:过去办婚礼,锅碗瓢盆都是从村里“众筹”的,但没听说谁嫌借来的锅碗不干净,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也开始使用一次性餐具了,结果反而觉得不卫生了,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正当我不知该不该听从大刘的建议,把纸巾也扔掉时,大刘接着说,他后来觉得纸巾厂的环境太恶劣,跳槽去了一家果汁厂工作,结果发现情况比纸巾厂好了哪去。大刘说他就职的那家果汁厂也是小作坊,很多果汁都是加上色素勾兑的,生产车间里冬天还好一点,夏天是蚊蝇横飞。为了健康,他也是没干多久就辞职了。

这两次的打工经历让大刘没挣上什么钱,反而落下了“毛病”:现在对于纸中、果汁,大刘一般都是不用、不喝,除非是大品牌、大厂家的,这也让大刘在平日的生活中因此时不时地遭到调侃,大家都笑大刘去打工一起,钱没挣到,对生活的品质却不切实际地提高了。(关晓海)